

试论北宋及两宋之交的徽州理学思潮^{*}

周晓光 周慧珺

摘要 徽州理学的书写,可以从北宋初年理学思潮甫兴开始。在北宋早期即有徽州学者接触和传播理学,后期还出现了诸多有一定影响的学者,主要代表人物有闵景芬、江致一、江致虚、朱松、程鼎、滕恺、李缙等人。他们的言行,谱写了理学在徽州地域化的序章。北宋及两宋之交,徽州出现理学思潮,有着深刻的学术背景和特殊的地域因素。它为其后该区域出现朱子学的重要学术流派——“新安理学”,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学术基础。

关键词 北宋 徽州 理学

中图分类号 B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627(2015)05-0078-09

作者:周晓光,男,1964年生,江苏昆山人,历史学博士,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明清史和徽学研究。合肥 230039。周慧珺,女,1983年生,安徽铜陵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芜湖 241000

徽州在南宋之后,素称“理学之邦”。朱熹所开创的新安理学流派,对12世纪以后中国哲学和学术思想的发展,以及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①。徽州方志记载“自宋元以来,理学阐明,道系相传,如世次可缀。”^②徽州之理学,既有名家辈出的规模,更有传承有绪的学脉。而在考察徽州理学何以兴起问题时,以往文献记载与学界描述,多以朱熹为源头。明弘治《徽州府志》和清乾隆《绩溪县志》均谓“自朱子而后,为士者多明义理,称为‘东南邹鲁’。”^③《婺源县志》更明确指出“自唐宋以来,卓行炳文,固不乏人,然未有以理学鸣于世者。至朱子得河洛之心传,以居敬穷理启迪乡人,由是学士争自濯磨以冀闻道。”^④以朱熹为徽州理学的首倡者。学界在梳理徽州理学谱系时,一般也多从朱熹说起,由此导致了有关徽州学术史的一个认识误区,即徽州理学始于南宋、源自朱熹。通过对史料的爬梳,笔者认为,作为朱子学重要流派之一的“新安理学”固然源自朱熹,但徽州理学源头在北宋时即已出现。本文主要考察徽州理学在北宋及两宋之交时的情形,一则正本清源,重塑徽州理学之谱系,二来也是探求新安理学学派形成的本土诱因。

^{*} 本文系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千年徽州家谱与社会变迁”(项目编号:11&ZD094)的阶段成果之一。受“安徽大学校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引进工程”资助。

① 参见周晓光《新安理学》,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 康熙《祁门县志》卷1《风俗》。

③ 弘治《徽州府志》卷1《风俗》、乾隆《绩溪县志》卷1《方輿志·风俗》。

④ 光绪《婺源县志》卷3《风俗》。

理学最早何时传入徽州,尚不见确切记载。根据徽州文献考索,北宋时当已有徽州学者开始接触理学。天禧二年(1018),向敏中撰《闵氏尊圣阁记》,文中曰:

歙西地之佳胜者,有岩寺镇;据镇中之尤胜者,则有尊圣阁,为闵氏贮书处,故名尊圣。岿然屹立于岩溪,高薄云霄。黄罗、黄山诸峰,如屏如障,如阁如楼,龙马诸形,映带左右。南山紫极宫对峙。阁旁建石塔一座,以像文笔峰,与东鲁轩、闾闾堂相为特立。乃镇之隐士闵景芬先生所创,贮书万卷余,日夕与子弟侄辈及从游者讲明奥理,不就征辟,专志于理学。远近学者咸宗之。阁成二十稔,先生遗世。又十稔,从子惟庆始以其学登第,官拜屯田员外,以清慎见重于时,实予榜中之翘楚者。虑先生之德弗彰,而向未有记之者,乃请于予。窃谓圣道不传,异端得肆,邪说得以欺世,理学不明,后进从事辞章以干时,苟趋功利,而于圣贤传道之要,不复有明之者。汉、唐盛时,表彰者惟仅数人;迨至五季扰攘之际,干戈糜烂,斯道遂晦。天启我宋,太祖、太宗皆以天纵之圣,以斯道为己任,作兴人才,五星聚奎,以彰文明之治。化行天下,风俗移易,诗书礼乐,比隆三代。先生值兹景运,高蹈林泉,以明经为事,建阁贮书,而以尊圣为名,其志可尚也已。^①

这是一篇有关徽州理学史的重要文献。尽管关于闵景芬之行实,包括收录该文的《岩镇志草》在内的徽州文献未见记载,但从向敏中的《闵氏尊圣阁记》中,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重要信息,即早在北宋天禧年之前,徽州已有学者在探究并传播“理学”^②。据“远近学者咸宗之”一语推测,徽州当有一批士子正热衷于此学。其时,北宋理学思潮刚刚兴起,理学体系尚未成形,被后世尊为宋代理学真正奠基人的周敦颐(1017—1073)和张载(1020—1077)或刚满周岁,或还未出生,因此闵景芬“专志于理学”,其实是追踪了北宋理学初起时的学风,讲究“圣贤传道之要”。这条史料的重要之处,在于说明徽州的理学史,与宋代理学的兴起、发展是同步的。

其实,类此信息在徽州文献中还有透露。笔者注意到在明人程敏政《新安文献志》中收录有一篇《江石室致一传》,文曰:

江致一,字得之,休宁石佛人。少与兄致虚游安定胡公之门。致虚以优校释褐,授太学录,号松菊先生。致一宣和乙卯乡举首选,继入太学。靖康中,伏阙上书者六,乞斩京、贯等六奸臣,复李刚相位。皆如其请,名震中外。寻中兵科优等,授承信郎。高宗即位,赦书下江东,访求致一。有旨特换文资与正录,力辞不拜。乃归营别墅,学者号石室先生。有集五十卷。三子衰、袞、褰。袞从学东莱吕公,号南斋,著临淄家传。褰子宋符,乡贡两魁,授本府儒学正。宋符子应求,魁漕试,授登仕郎,号畏斋。^③

传中言及休宁江致一与其兄江致虚曾从学于胡安定门下。胡安定即著名的“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993—1059)。胡氏所创的“苏湖教法”主张分科教学,立“经义”和“治事”两斋,前者讲明六经,后者研

① 余华瑞《岩镇志草·艺文上》,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27,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② 此处“理学”一词,与后世又称“道学”之理学者,其内涵当有所区别。但据向敏中评述闵景芬针对“圣道不传”,专门“以明经为事”,注重“圣贤传道之要”来看,其学术的出发点与后来以性命义理为主要内容的“理学”是一致的。

③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77《江石室致一传》,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版。该传又见道光《徽州府志》卷11《人物志·儒林》。《宋元学案》卷1《安定学案》列江致一为“安定门人”,有小传。

究致用之学,在当时影响广泛^①。北宋名臣蔡襄在《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中称胡瑗“解经至有要意,恳恳为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后治乎人者。学徒千数,日月刮削为文章,皆传经义,必以理胜;信其师说,敦尚行实,后为大学,四方归之。”^②侯外庐等著《宋明理学史》称“这一学风的转变,意味着理学的开端。”^③这种看法在理学史上,可以说是公论。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就首列“安定学案”和“泰山学案”,全祖望按曰“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④将胡瑗视为开宋代理学风气之先的人物。明世宗嘉靖九年(1531),正式以胡瑗从祀孔庙,称“先儒胡子”。由此可见胡瑗在宋代理学史中的重要地位。休宁江致一与其兄江致虚早在宋初即拜在胡瑗门下,再次证明徽州理学的书写,可以从北宋初年理学思潮甫兴开始。

在北宋年间,类似闵景芬、江氏兄弟接触、研习理学的徽州学者,当不在少数。只是由于文献记载阙如,具体详情已难考证。不过,可以确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理学思潮初入徽州应该在北宋前期,而不是习惯认识上的南宋朱熹到徽州之后。我们寻检徽州理学史资料,发现在早期徽州专注义理的学者中,还有不少人生活在北宋后期或者两宋之交。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朱松、程鼎、滕恺、李缙等。

朱松是朱熹之父,字乔年,婺源人。生于北宋绍圣四年(1097),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去世,享年四十七岁。《宋史》虽无朱松传记,但同时代名相周益公(必大)撰有《朱献靖公神道碑》,朱熹在庆元五年(1199)亦亲撰《皇考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累赠通议大夫朱公松行状》,叙其一生行实甚详。关于朱松的学术,朱熹在《行状》中有一段详细叙述:

公生有俊才,自为儿童时,出语已惊人。少长,游学校,为举子文,即清新洒落,无当时陈腐卑弱之气。及去场屋,始放意为诗文。其诗初亦不事雕饰,而天然秀发,格力闲暇,超然有出尘之趣,远近传诵,至闻京师,一时前辈以诗为鸣者,往往未识其面而已交口誉之。其文汪洋放肆,不见涯涘,如川之方至,而奔腾蹙沓,浑浩流转,顷刻万变,不可名状,人亦少能及之。然公未尝以是而自喜,一日喟然顾而叹曰:“是则昌矣,如去道愈远何?”则又发奋折节,益取六经、诸史、百氏之书,伏而读之,以求天下国家兴亡理乱之变,与夫一时君子所以应时合变先后本末之序,期于有以发为议论,措之事业,如贾长沙、陆宣公之为者。既又得浦城萧公颢子庄、剑浦罗公从彦仲素,而与之游,则闻龟山杨氏所传河洛之学,独得古先圣贤不传之遗意。于是益自刻励,痛刮浮华,以趋本实,日诵《大学》、《中庸》之书,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自谓“卜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韦”之义,以名其斋,早夜其间,以自警飭。繇是,向之所得于观考者,益有以自信,而守之愈坚。故尝称曰:“士之所志,其分在于义利之间,两端而已。然其发甚微,而其流甚远。譬之射焉,失毫厘于机括之间,则差寻丈于百步之外矣。”又常以为“父子主恩,君臣主义,是为天下之大戒,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如人食息呼吸于元气之中,一息之不属,理必至于毙。是以自昔圣贤立法垂训,所以维持防范于其间者,未尝一日而少忘其意,岂特为目前之虑而已哉?”^⑤

朱熹在此段文字中,描述了朱松一生的学术轨迹:先是少年时,为应科举考试,乃“游学校”,专一于“举

①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25《胡先生墓表》云“其在湖州之学,弟子去来常数百人,各以其经转相传授,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

② 蔡襄《蔡忠惠公集》卷33《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

③ 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第1章《理学先驱“宋初三先生”及其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④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1《安定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⑤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68《朱熹:皇考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累赠通议大夫朱公松行状》。

子文”此为第一阶段;告别场屋后,遂“放意为诗文”,学术之路进入第二阶段;其后又伏读“六经、诸史、百氏之书”,特别是与剑浦罗从彦(仲素)结交,罗氏乃著名的“程门四大弟子”之一杨时的高足,朱松因此得闻杨时所传的“河洛学问之要”,并且“拳拳服膺”,成为二程理学的信徒,这是第三阶段。宋代有不少学者一生的学术之路,也先后走过这三个阶段,而朱松最后的学术归宿,则达到了一定的境界。据《宋元学案》记载,罗从彦对朱松的为学、立身十分赞赏,称之“才高而智明,其刚不屈于俗”^①。朱松极为推崇《大学》,认为它是“入道之门,其道以为欲明明德于天下,在致知格物以正心诚意而已”,人们若能不断地学仁学义,则“朝发轫乎仁义之途,而夕将入大学之门,以躡中庸之庭也”。他主张尊德敬,贱功利,严义利之辨,认为“士之所志,其分在于义利之间,两端而已”。他还强调君臣之义,认为其“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如人食息呼吸于元气之中,一息之不属,理必至于毙”,并指出士人“溺于俗学,不明君臣之大义,是以处成败之间者,常有苟生自恕之心,而暗于舍生取义之节,将使三纲沦坠,而有国家者无所恃以为安”,呼吁“奖名节”以弘扬君臣之义^②。在学术的最后立足点上,朱松已经俨然是理学一醇儒矣。所以黄宗羲说“故朱子之学虽传自延平,而其立朝气概,刚毅绝俗,则依然父之风也。”^③将朱熹理学与朱松联系在了一起。

北宋后期与两宋之交徽州的理学学者朱松而外,还有程鼎。程鼎(1106—1165),字复亨,自号环溪,朱松内弟,婺源人。朱熹有《环溪翁程君鼎墓表》云:

(程鼎)少孤,从先君子学于闽中,因得讲闻。一时儒先长者之余论而心悅之,抄缀诵习,晨夕不少懈。先君子爱其勤敏,于其归,书六言以赠之,皆事亲修身为学之要。君拜受其言以归,益自树立,务记览为词章,思所以大其门户者。然君为人坦夷跌宕,不事修饬,好读左氏书,为文辄效其体,不能屈意用举子尺度,以故久不利场屋。家故贫,至君益困,终岁奉亲徙居穷山中,自号“环溪翁”。山田数十亩,环堵萧然,无以卒岁,而君处之泊如也。晚益不得志,因自放杯酒间,酒酣讽左氏书,杂以国风雅颂之篇。闻者耸然倾听,俯仰疾徐之间,顿挫抑扬,如有节奏。至于放臣孤子,怨夫寡妇之词,又未尝不三复感慨而出涕流涟也。庸夫孺子,从傍窃观或笑侮之,君警然不以为意,盖其中所抱负有不得骋者,故托以自遣。至他行事,则其不合于理者固鲜矣。乾道元年五十九,以疾卒。^④

朱熹《墓表》描述的程鼎,是一个穷困潦倒、落魄不得志的学者。他的学术,受于朱松。朱松因“爱其勤敏,于其归,书六言以赠之”。据朱松《送程复亨序》谓,“六言”乃葬吾舅而后加吉服;萑尔居,以宁尔亲;非尔父之类者,勿亲也;广学问以资见闻,宴安鸩毒不可怀也;勿怀安;无忘四方之志^⑤。此六言,确实是朱熹讲的“皆事亲修身为学之要”。从《墓表》所述看,程鼎学术尤长于《左传》、《诗经》。只可惜,程鼎入《左传》太深,所以“为文辄效其体,不能屈意用举子尺度”,在科场上一败涂地。但这并不影响程鼎在徽州理学史谱系中的地位,一方面他本人从学于朱松,在北宋后期及两宋之交的徽州理学学者中是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另一方面,其子程洵后来从学于朱熹,是南宋新安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从新安学派的学术渊源上来说,程鼎是其中传递的重要一环。

同时期有代表性的徽州理学学者还有滕恺。滕恺,字南夫,系徽州婺源人。程瞳《新安学系录》卷3《滕户曹》称其“受学于尹和靖门人吕公广,同登绍兴五年进士,调信州司户参军,卒。所著有《溪堂集》。李钟山述其行实,为传。朱子称其笔力奔放,法度严谨。今访求未得,无以考其言行之详。”说明最迟到

①②③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39《豫章学案》。

④⑤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87。

明代中叶,关于滕恺的学术思想及其行迹之详,已经湮没。宋代婺源人程洵撰有《钟山先生李公缙行状》,其中部分文字涉及滕恺,该《行状》为我们了解滕氏的学术来路提供了线索:

自朝廷设元祐学术之禁,士非王氏书不读。宣和禁稍弛,而远方人士,徇于所习,未尽变也。婺源又居重山复岭间,见闻尤狭隘。逮兵兴,四方云扰,贤士大夫多避地其间,于是有吕公兄弟曰和问、曰广问者,和靖尹先生高第,传伊洛致知笃敬之学。又有俞公靖者,亦里儒先也,多识前言往行,其学出入坡、洛之间。先生与里人滕公恺悉从此三君子游。滕公长先生六岁,负才气,不肯友不如己者,独器重先生,目为“小友”。尝将闽中所刻东坡先生文章号大全集者,相与读之,叹其编次无法,真贋相杂,奋然取朱黄尽涂去不类者。滕公见之惊曰:“子后生,敢尔邪?”他日得苏氏家传本校之,果皆非也。益奇之,乃出一编书示之曰:“好文而不知道,空文也。此书吾得之罗公,皆河洛遗言,公戒勿轻示人,吾今日为子发内府之秘矣。”先生受之以归,口诵心惟,默若有省。间有所疑,又从诸公质之。于是学问日进。^①

李缙行状中涉及滕恺的记述,说明滕氏的学术受于尹和靖高足吕和问、吕广问以及乡先贤俞靖。这一点,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之《和靖学案》也有提及。按照《宋元学案》的说法,“和靖尹肃公于洛学最为晚出,而守其师说最醇”^②。而俞靖之学,也是“出入坡、洛之间”。因此,从学源来说,滕恺可谓是宋代理学奠基人二程的嫡传。

与滕恺几乎同时且为知交的李缙,也是两宋之交徽州的知名理学学者。李缙(1116—1193),字参仲,“世新安婺源儒家也”,学者称钟山先生。其父李镛曾游太学,建炎初累举补官,为南康军建昌尉、饶州司法参军、太平州军事推官等。据朱熹《跋〈吕仁甫诸公帖〉》说:“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吕公广问仁父来主婺源簿,而奉其兄和问节夫以俱。……于是李氏父子得从之游,而滕户曹恺南夫亦受其学。观于此卷,可见一时尚学源流之盛矣。”^③因吕氏兄弟乃“洛学”嫡传尹和靖高足,故二吕所传皆“伊洛致知笃敬之学”,李缙之学术,可谓“其来有自”。尽管李缙一度曾“出入释老,求之者数年”,但最终还是“知其说不出乎吾宗,乃益自信”^④,成为理学的坚定信徒。朱熹有《书李参仲家藏〈二程语录〉后》,其中言:

程氏书初出时,人以其难得而珍贵之,然未必皆能讲究而践行之也。近时以来,传者浸广,而后人知其如丝麻穀粟之不可一日无。然真能好之而不舍者,则亦鲜矣。因观吕、滕、李三君子传授旧编及李丈跋语,窃有感焉,谨识于后。^⑤

朱熹在文中表彰了李氏等对二程学说“真能好之而不舍者”。在朱熹看来,这种发自肺腑的尊崇,才是至为难得的。李缙一生不事科举,独钟情于问学。其治学,“不务多为训说,独尝著《〈论语〉、〈西铭〉解义》、《山窗业书》数篇而已”^⑥。虽然著述无多,但李缙于义理之学发明不少。特别是提出“致心之道敬为要”和“持身之道,知耻为要”,于后学者启发颇大。关于“敬”为“致心之道”,李缙说:“敬者,心之闲辔也。心有不敬焉,则驰矣。敬而不已则明,明则诚。故学者致心之道,敬为要”。他强调,“学者于道,能致知以玩索之,笃敬以涵养之,久则见面盎背,气象自别,非声音笑貌所能为也。”^⑦关于持身之道以“知耻”为要,李缙也有一番论说:“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勇于弃廉耻,则勇于废礼义。一维苟绝,四维皆

①④⑥⑦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87《程克庵:钟山先生李公缙行状》。

②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27《和靖学案》。

③ 程瞳《新安学系录》卷3《朱熹:跋〈吕仁甫诸公帖〉》。

⑤ 程瞳《新安学系录》卷3《朱熹:书李参仲家藏〈二程语录〉后》。

灭,理之相牵联者也。四维张,其心康,其身昌;四维不张,其心荒,其身灭亡。故学者持身之道,知耻为要。”^①在李缙看来,礼义廉耻“四维”是相互牵联的,若是其中一维灭绝了,则四维皆灭;而若四维灭绝,人无颜存活于世。他还就如何“学道”告诫后学者“道有远近,学无止法。近者道也,远者亦道也。学者见其近而不见其远,遽止于见,则陋矣。惟于见处,更加功夫,进进不已,自然所造深远,而其成也宏矣。”^②主张“学道”需要“进进不已”,方能“所造深远,而其成也宏矣”。与世儒抵触学文不同的是,李缙推崇眉山苏氏关于文章的见解“物固有是理,患不能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于手。辞者,达是而已矣。”传记记载李缙“雅好文词,既老不衰”,曾说“文者所以载道,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而世儒或以文为不足学,非也。顾其言于道何如耳。”他为文“指事析理,引物托喻,要以达意。所欲言者,而词采自然,如风行水上,如浮云游太空中,姿态横生,可喜可愕。”朱熹也曾推许李缙之文“笔力奔放,而法度谨严,学者所难及也”^③。由于李缙“优游涵养,学益成,行益尊”,所以乡人多“宗慕之”,而大凡有来学者,李缙亦“随其资诱之,循循不倦”,为理学在徽州的早期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

由上观之,北宋早期即有徽州学者接触和传播理学,后期还出现了诸多有一定影响的理学学者。他们的言行,谱写了理学在徽州地域化的序章。

二

北宋及两宋之交,徽州出现理学思潮,有着深刻的学术背景和特殊的地域因素。

首先,传统学术的转型,为徽州理学思潮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有学者指出,“唐代文化的繁荣,究其内容,文风特盛,一般知识分子尤为崇尚文学艺术,在声律浮华之中优游岁月”^④。徽州在唐、五代时,风尚开始由此前的“崇武”转变为“重文”,而学者之学风,亦偏倾在文学艺术。如开徽州学术文化风气之先者吴少微(659—743),名远,字仲芳,又字仲材,号邃谷。武则长安元年(701)中进士。宋罗愿《新安志》记载:“(少微)长安中累官至晋阳尉,与武功富嘉谟同官友善。先是天下文章以徐、庾为宗,气调益弱。独少微、嘉谟属词本经学,雄迈高雅,时人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吴富体。”^⑤稍后于吴少微的祁门人张志和(714—774)和洪族徽州始迁祖洪经纶,是另二位开徽州学术文化风气之先的人物。前者早年以明经登第,任翰林待召,以诗画扬名天下^⑥;后者为唐玄宗天宝六年(747)进士,曾出为宣歙观察使,“稍暇与士人讲论,为宣歙文学首倡”^⑦。其时徽州学者的儒学成就,并不突出。

入宋之后,徽州学者开始关注儒学。而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学术正面临重要的转型。陈钟凡先生在《两宋思想述评》中认为,“考宋学勃兴之主因,更以下列四事明之”,即“儒学之革新”、“道家之复起”、“佛教之调和”、“西教之东渐”。其中关于“儒学之革新”,言“前儒说经,竺守古说,无取新奇,自宋代斯风丕变。……盖宋人不信传注,进而议及本经也。……庆历以来,学风之变,荒经蔑古,莫兹为甚。”

①②③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87《程克庵:钟山先生李公缙行状》。

④ 韩钟文《中国儒学史》(宋元卷)第2章《宋代文化的复兴与新儒学的崛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⑤ 淳熙《新安志》卷6《先达》。吴少微籍贯有二说,《新唐书》和《旧唐书》皆称新安人,《祥符图经》具体指为歙县人,《唐御史台记》则言其为渤海人。自罗愿《新安志》始,徽州地方文献均以少微为歙县人。

⑥ 张志和今传《玄真子》3卷,诗词9首。其《渔父词》五首之一:“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最为著名。

⑦ 弘治《徽州府志》卷7《人物传》。

然怀疑之风既著,治学之道日新,诸儒乃能舍训诂而言性与天道,以造成近代之‘新儒学’也。”^①也就是说,宋之前学者治经,多重经注、经解,而宋人则不信传注,主张直接从经文中探求心性义理。传统学术的这一转型,开启了宋代学术的新学风,也成为宋代理学思潮出现的重要原因。学界对此现象多持相同看法,如有学者认为“宋儒治经,大多不拘泥于章句注疏,重在发新见、创新义、立新论,甚至疑经改经,一扫汉、唐经学末流烦琐、僵固的章句训诂之学的沉闷气氛,蕴成疑古惑经的时代思潮,复活了先秦儒家的原创精神、理性精神。”^②徽州在北宋及两宋之交出现理学思潮,正是基于其时儒学之复兴,尤其是传统学术的转型。我们注意到,上文提及的朱松“日诵《大学》、《中庸》之书,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认为《大学》是“入道之门,其道以为欲明明德于天下,在致知格物以正心诚意而已”^③;李缙著《〈论语〉、〈西铭〉解义》等书,提出了“致心之道敬为要”和“持身之道,知耻为要”等观点^④。他们的学术理路不再是汉儒的章句注疏、字义训诂,而是直探经义、阐发性理,是典型的理学路子。这一现象,正是传统学术转型之所致。

其次,北宋理学的发展,为徽州理学思潮的出现提供了支撑。

理学作为一个时代的思潮,滥觞于唐代中叶。韩愈提倡“文以载道”,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说”,推崇《大学》,著《五原》以排斥佛老,力图恢复先秦的儒学。其弟子李翱据《中庸》而著《复性说》,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论。韩、李在佛教盛行的氛围中,开创了一代学风。而与他们同时代的经学家啖助及其门人赵匡、陆淳所治的《春秋》学,主张破注从经,以己意说经。这些都为北宋理学的兴起开了先河。按照南宋理学家朱熹的看法,北宋理学的发展“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⑤就是说,北宋初胡瑗、孙复、石介开创的以义理说经之风,是后来理学大家们出现的重要原因。因此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泰山学案》中引黄震的《黄氏日钞》语“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⑥宋初三先生之后,理学大家迭出,先有周敦颐继承韩氏“道统说”,并融会佛道思想,著《太极图》及《通书》40篇,“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始终”^⑦,成为北宋理学的开山祖。稍后,河南二程受业周氏,“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⑧。关中有张载作《西铭》,极言“理一分殊”之旨;又有河南邵雍著《皇极经世书》,建立了象数学思想体系。“五子并时而生,又皆知交相好”^⑨,他们著书立说,推动了北宋理学的发展。

徽州在北宋和两宋之交出现理学思潮,与北宋理学的发展有着极深的渊源。这种渊源最集中表现是徽州的理学人物大多与北宋理学先驱或名家有着师承关系。比如休宁人江致一与其兄江致虚曾从学于胡瑗门下,当时胡氏“以经术教授吴中”,“从之游者常百余人”^⑩。史称“东南之人知以经行为先,道

① 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第2章《两宋学术复兴之原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② 韩钟文《中国儒学史》宋元卷第2章《宋代文化的复兴与新儒学的崛起》。

③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39《豫章学案》。

④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87《程克庵:钟山先生李公缙行状》。

⑤ 朱熹《朱子语类》卷129,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⑥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2《泰山学案》黄百家按语引。

⑦ 脱脱等《宋史》卷427《周敦颐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⑧ 脱脱等《宋史》卷427《道学一》。

⑨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9《百源学案》。

⑩ 脱脱等《宋史》卷432《胡瑗传》。

德为本,实先生始之也”^①。婺源人朱松之学术,则出于杨时(龟山)。相关传记资料记载,朱松“既又得浦城萧公颙子庄、剑浦罗公从彦仲素,而与之游,则闻龟山杨氏所传河洛之学,独得古先圣贤不传之遗意”^②。而杨时为二程四大弟子之一,被奉为“程氏正宗”。程鼎为朱松内弟,“少孤,从先君子(朱松)学于闽中,因得讲闻”^③,也与二程理学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李缙、滕恺的学术受于尹和靖高足吕和问、吕广问,而尹和靖又是程门“守其师说最醇”^④的弟子,因此从学源来说,李缙、滕恺是宋代理学奠基人二程的三传弟子。这一现象表明,正是因北宋理学先驱或名家的嫡传,徽州学者开始致力于性理之学的探讨,徽州出现了理学思潮。师承关系之外,北宋理学的发展对徽州理学思潮影响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徽州的学者还直接继承了北宋理学家的论题和思想成果。如朱松讨论的“致知”、“诚意”、“格物”、“正心”,李缙阐述的“敬”、“致心之道”、“持身之道”等,为北宋理学大家所反复讨论和发挥。李缙还著有《〈西铭〉解义》,梳理和阐释理学大家张载的思想,曾将二程之书“受之以归,口诵心惟,默若有省。……于是学问日进”^⑤。徽州学者对北宋理学大家们思想成果的承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徽州理学思潮的出现得益于北宋理学的发展。

再次,徽州风尚的转变,为徽州理学思潮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徽州古属越文化圈,宋以前其风尚一直以“崇武”为基本特征。所谓“锐兵任死,越之常性”^⑥,即是徽州唐宋以前民风与民俗的真实写照。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亦说“武劲之风,盛于梁、陈、隋间,如程忠壮、汪越国,皆以捍卫乡里显。”^⑦唐、五代时,虽有吴少微、舒雅、张志和等人以“文”著称,而徽州一地风尚的彻底转变,则在北宋立国之后。正如淳熙《新安志》说“其(新安)人自昔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其后寝有文士,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⑧徽州之风尚,在北宋由原先的“崇武”而全面转变为“尚文”,史籍和方志中多有反映。如生活在两宋之交的洪适(1117—1184)在《休宁县建学记》中称“休宁之人,盖以乡校为先务,早夜弦诵,洋洋秩秩,有洙泗之风。”^⑨北宋时,徽州一府六县先后建有桂枝书院、乐山书院、龙川书院、四友堂等书院,吸引一批学子从学其中,反映了徽州“尚文”之风的兴盛。乾隆《绩溪县志》谓“学校者,化民成俗之本也。州县立学,始自宋之庆历。”^⑩揆诸史料记载,徽州府学在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即已重建,祁门县学重建于端拱元年(988),黟县学也在宋初建立。而婺源县学、休宁县学则初建于宋仁宗庆历年间。书院与府、县学的建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徽州崇尚“文雅”风气的盛行。此等风俗,较之唐宋以前的“崇武”民俗与民风,已是大为不同。

徽州在北宋时的风尚转变,为该地理学思潮的出现准备了条件。第一,“尚文”的环境,造就了一批徽州士人,而这些士人成为理学思潮出现的人才基础。在徽州书院和府、县学中,士人研习儒家经典,传承儒学文化传统,成为一地学术文化人才。受“尚文”风气影响,北宋徽州“业儒”者众多,如宋初歙县闵

① 《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卷10《胡瑗》。

②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68《朱熹:皇考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累赠通议大夫朱公松行状》。

③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87《朱熹:环溪翁程君鼎墓表》。

④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27《和靖学案》。

⑤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87《程克庵:钟山先生李公缙行状》。

⑥ 《越绝书》第8卷《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

⑦ 许承尧《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

⑧ 淳熙《新安志》卷1《风俗》。

⑨ 康熙《休宁县志》卷21《艺文纪述》。

⑩ 乾隆《绩溪县志》卷3《学校》。

景芬“贮书万卷余,日夕与子弟侄辈及从游者讲明奥理,不就征辟,专志于理学。远近学者咸宗之”^①;婺源李缙“优游涵养,学益成,行益尊,乡人宗慕之。……有来学者,随其资诱之,循循不倦”^②,表明当时徽州有一批士人倾心于儒学。一种思潮的流行,离不开传播者和从学者。正是基于“尚文”环境下造就的这些学者,徽州理学思潮得以出现和传播。第二,“尚文”的风气,推动了徽州学者的学术交流,由此引发了理学思潮在徽州的传播。据相关史料记载,在“尚文”的风气推动下,北宋徽州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频繁。如李缙与滕恺之间,学术交往密切,而二人又与洛学传人吕和问、吕广问以及“里儒”俞靖来往甚密,传记资料谓其“从此三君子游”。他们所习所传者,“皆伊洛致知笃敬之学”^③。由此可见,学术交流其实是理学思潮传播的重要途径,而这种交流得益于一地浓厚的文化氛围与风气。就上述二方面来看,徽州在北宋风尚的转变,为该地理学思潮的出现和传播准备了条件。

综上所述,北宋及两宋之交徽州出现理学思潮,既有中国传统学术转型、北宋理学发展等深刻的学术背景,也受徽州出现由“崇武”到“尚文”风尚转变的地域因素影响。在徽州理学思潮出现后,呈现了几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以传承“洛学”为主,二是讲学风气盛行,三是徽州境内外交流频繁,四是不少徽州学者对相关问题有一己之见。虽然在北宋徽州理学思潮中,并未出现有重大影响的学者,但徽州该时期理学的发展仍具有特殊的地位,即它为其后该区域出现朱子学的重要学术流派——“新安理学”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学术基础。

① 余华瑞《岩镇志草·艺文上》,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27。

②③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87《程克庵·钟山先生李公缙行状》。